

一次權力逆轉 —— 性工作者分享座談會

胡世君

雖然我並非首次參與性工作者分享座談會，但這次感覺有點不一樣，也讓我體會到傅柯(Foucault)所說，「權力」從來不是牢固不定，它可以流動，而且沒有一方擁有絕對壓倒性優勢。而每當權力出現，與之抗衡的阻力便油然而生。

那天，「紫藤」和「姐姐仔會」的3名代表到達某學校，就「性工作者」議題與80名學生進行分享。讀者對於「紫藤」或早有所聞，它是一間由社會工作者、婦女研究員、勞工工作者等組成的關注性工作者組織，已為爭取性工作者權益打拼了十年光景。而「姐姐仔會」則是本年度才正式成立的女性性工作者助自團體，屬本港首個同類型組織。為著讓更多人明白性工作者也只是一份「正當職業」，她們經常走訪不同團體進行宣傳教育，這次目的地便是一所大專院校。

我說是次座談會有點不同，主要是因為同學的發問重點由過往好/獵奇的角度，轉向為性工作「道德」與否的討論。他/她們從前總愛問「每一次收費多少？」、「有否遇過『變態』客人？」、「你的兒子知道你幹這種事嗎？」……問題大同小異，而他/她們也較少提出批判性的觀點和提問。然而這次，他/她們總算做到了。(儘管那仍然片面)。事後不少學生反映，講者跟聽者之間甚至有點短兵相接的「辯論」況味。

常說性工作者受到主流社會/論述壓迫(如警方、議員、良家婦女、惡客)，她們擁有權力不多，故需要透過爭取法律改革和去污名化等過程，讓「姐姐仔」獲得公平待遇，安心做好工作。儘管改變社會並非朝夕之事，但示威遊行、到校分享等行動，起碼能替她們「充權」(Empowered)，使她們更有信心地走在人前。進入

學校不單止為教育年青人，也是她們獲取權力的手段。而在這次聚會中，我目擊了她們如何把權力逆轉，借用既得利益者傳遞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教化場域，成功挑戰了壓迫/被壓迫者二元關係，這正正跟傅柯之說不謀而合。

本來學生跟性工作者的權力關係理應是一面倒的：人多勢眾/勢孤力弱、高學歷/低學歷、擁有知識/學識不多、未來人材/從事「不道德」行業.....但當性工作者以「嘉賓」身份登上演講台，她便從身份低微的一群，躍升為「有識之士」——知識來源於被污名化的職業、不能曝光的身份、不值一提的工作過程、受盡歧視的辛酸經歷.....學生們更要遵守由性工作者所定立的「遊戲規則」：先舉手，後發問，而回答的次序及向度均由性工作者決定。傅柯認為權力不是純粹壓逼性 (Repressive) 的，它也有其建設性，可以產生知識和論述。此時此刻，性工作者利用受到壓逼的經驗作為武器，在學校之內顛覆了既存權力關係，就像在大聲宣讀聲明——若你這認為當性工作者是一個問題，那只是你的偏見，你對世情太不理解。我現在便教導你何謂對錯，你給我聽清聽楚。

性工作者在學校這場域獲取了說話主導權，在演講廳內教導學生那套老師不會教授的論述。

及後同學從「道德」角度發問：「你會否認為這跟『道德』有所抵觸？」紫藤的社工回應：「那你認為甚麼是道德？」、「道德這個字包含的意思這麼多，你指甚麼？」、「聖經內那一句說當性工作者不道德？」、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(難道)所有在場所的女同學都不道德」.....事後同學告訴我，他/她們本想回應，但在剎那之間卻又進退失據，只覺瞪瞠結舌。何謂「道德」，彷彿眾人皆知一目了然。可是當強而有力的主流說法步步進逼，社工卻來個借力打力，憑藉堂而皇之的「道德」去反對那種(看似)「絕對」的道德觀。性工作者受到壓逼，令紫藤一類機構出現，而備受壓逼的社群又試圖在種種大話語(Grand Narrative)中找尋另類可能

性。社工雖受過相關訓練，但她所持的觀點也是來自性工作者(或所有受到壓逼的階級)在受壓之時所產生出來的另類論述與知識。這回應了傅柯所說，權力的壓逼性會產生新的論述，受到壓逼的人可用此來還以顏色。

一星期之後，同一所學校 25 名學生與姐姐仔會另一代表交流，那性工作者自我介紹：「我叫 XXX，是一名性工作者……」她把「性工作者」四字說得清楚俐落，也許在她眼中，性工作者與社會工作者根本沒有高下之分。同學們於交流之後，均異口同聲地認為：「你很像社工……」。

性工作者，原來也可以很有權力。

參考資料：

紫藤，<http://www.ziteng.org.hk/>。

Jagose, Annamarie (1996). Queer. In *Queer Theory: An Introduction*. New York: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. P. 101-126.